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 西汉《春秋》学

——以《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升降为例

吴涛 著

雖無事必舉正月

元年之正月非元年謹始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

西汉《春秋》学

——以《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升降为例

吴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术”、“学” 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以《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升降为例/吴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

ISBN 978-7-5161-0144-5

I. ①术… II. ①吴… III. ①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①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258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4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序

张宝明

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の寄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

也正由于此，在儒生的眼中，《春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经典所无法取代的。据孟子说在孔子修成《春秋》之后就立即收到了“乱臣

贼子惧”的效果。以我们今天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仅以经学即将衰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例,《春秋》无疑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部儒家典籍。常州学派兴起以后,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开始复兴。至清末就发展到顶峰,成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的《春秋》学继承了汉代《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大张三世之说,认为孔子在修《春秋》时把24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而且于所传闻世见据乱,于所闻世见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康有为认为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太平世,所以还不能施行共和,而只能进行立宪。为了张大《公羊》,他还极力攻击《左传》,说《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割裂《国语》而伪造的,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帮助王莽篡逆。他认为自己是发千古前人所未发。而章太炎力主革命,所以针对康有为的《春秋》学,章氏大力提倡《春秋》攘夷说提倡革命,并极力表彰《左传》而写出了《春秋左传读》一书。

在经学时代终结以后,《春秋》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近代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疑古思潮就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典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康有为托古改制之说,更是对顾颉刚形成了很大的启迪。顾颉刚终身坚信《左传》系伪书。顾颉刚的重要发现是他的层累说。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他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左传》的看法,他认为刘歆的《世经》中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是在为王莽的篡逆服务。由于《左传》中有可以证成刘歆《世经》的内容,所以他就进一步说《左传》是伪书,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他认为刘歆通过伪造《世经》和《左传》,成功地将汉家之德由土改成了火,这样就可以使王莽顺利地以土代火。他就这样将自己的层累说与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说捆绑在了一起,为了维护层累说他不得不坚持刘歆造伪说,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于是关于《左传》的真伪,就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很多重量级的学者都陷入其中未能自拔。甚至在抗战中,著名学者杨树达还曾写出过《春秋大义述》一书,充分发挥《春秋》尊王、攘夷、复仇、大一统等观点,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今天，还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史学就要承担起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作用。那么今人的研究和前人有何不同呢？不同于前人经学式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经学史的研究。经学的研究，是信仰者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经学史的研究，是批判者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吴涛博士的《“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学史的著作。

吴博士以其导师朱维铮教授“术”、“学”两分理论为指导，对西汉《春秋》学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将西汉《春秋》学的进程与西汉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就西汉《春秋》学的事实而言，前人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在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传》被立于学官，而后汉宣帝时期试图扶持《春秋谷梁传》，汉哀帝时又在刘歆的倡导下试图扶持《春秋左氏传》。就这一史实，似乎争论不大。吴涛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在于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他首先注意到了《公羊传》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汉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接着揭示出《公羊》学的王道立场和汉家王朝霸道政治之间的矛盾，于是“革命”与“不准革命”也就成了西汉中后期《春秋》学史的主旋律。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汉《春秋》学的认识豁然开朗。著名大学问家严复说过：“持果求因，是为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涛博士论文“为什么”背后的问题意识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的意义存照。

可以看出吴涛的研究跳出了既往经学纷争的臼窠，没有把自己陷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老路上去。把西汉《春秋》三传的升降沉浮还原到西汉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做到了“论从史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学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它的发展更是与具体时代的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经学史研究，几乎都写成了学术史。经学是特殊的学术，这就决定了经学史并不能等同于学术史。通过吴涛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主因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选择。政治影响学术，似乎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吴涛的研究并非在空发议论，而是将他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据说当年孔子解释自己为何写《春秋》时曾经说：“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显然，吴涛的研究也是当得起“深切著明”这一评语的。

吴涛师出名门。在当下学风日益骄器的时代，我看到这本博士学位论文尤为欣慰。我在和他不多的交谈中，常能感觉到他学术功底的扎实、经学知识积累的深厚。我常说：“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足。”吴涛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在复旦“博学”、“切问”学风的熏陶下，在朱维铮教授的严格培训下，吴博士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2007年来到我校后，很快就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当然，吴涛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只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开始，我相信，他在自己学术道路上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简短交流中，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的纯粹、淳厚和执著。在抛开势利、功利这样沉重的包袱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涛以“静水流深”的心态，学术一定能走得更远。

目 录

序.....	张宝明(1)
绪论.....	(1)
一 西汉以后《春秋》学的历史发展和既有研究现状综述.....	(1)
二 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结构.....	(22)
第一章 “《春秋》无达辞”	(28)
第一节 《公羊传》与《谷梁传》在西汉前期的发展	(28)
第二节 独尊儒术:从顾问官到教育官的转变.....	(46)
第三节 “学”对“术”的迎合:董仲舒与公孙弘.....	(53)
第四节 “学”对“术”的迎合:“为汉制法”.....	(58)
第二章 “学”与“术”的纷争	
——巫蛊案背后的经学歧异	(73)
第一节 汉武帝对儒学的真实态度	(74)
第二节 巫蛊事件与轮台罪己诏	(89)
第三节 盐铁会议在西汉《春秋》学史上的意义.....	(102)
第三章 石渠阁会议.....	(128)
第一节 石渠阁会议与黄龙十二博士.....	(128)
第二节 《谷梁传》上升的社会原因分析.....	(134)

第三节	汉宣帝的出身及其与霍光的关系对《谷梁传》 上升的影响·····	(138)
第四节	《谷梁传》的亲亲尊尊理论与汉宣帝立《谷梁传》的 关系·····	(148)
第五节	“霸王道杂之”术与《公羊传》、《谷梁传》升降·····	(152)
 第四章 《谷梁传》在西汉《春秋》学史中的地位		
	——兼论《谷梁传》为古文说·····	(162)
第一节	《公羊传》、《谷梁传》异同论·····	(162)
第二节	“久假而不归”·····	(176)
第三节	论崔适《谷梁传》为古文说·····	(188)
 第五章 尾声		
	——新一轮的“术”、“学”纷争·····	(196)
第一节	汉哀帝其人·····	(196)
第二节	刘歆与王莽关系新论·····	(208)
第三节	“术”对“学”的再一次选择·····	(219)
 结论 ·····		(230)
 附录一 关于《春秋谷梁传》作者的推测 ·····		(232)
 附录二 西汉《春秋》学者小考 ·····		(249)
 附录三 西汉《春秋》三传传授图 ·····		(288)
 参考书目 ·····		(291)
 后记 ·····		(307)

绪 论

一 西汉以后《春秋》学的历史发展和既有研究现状综述

(一) 清末以前《春秋》学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

自汉武帝时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儒家经典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而《春秋》及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被认为是孔子微言大义之所系，所以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历代研究《春秋》学的书籍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下面仅就历代《春秋》学研究做一个极简单的回顾。

汉武帝表彰六经的过程中《公羊》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公羊》学对汉武帝时的政治起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所以《公羊》学首先被立于学官。汉宣帝时期，经过了汉宣帝的提倡和扶持，《谷梁传》又兴盛一时。到了西汉末年刘歆又在汉哀帝的支持下提出要把《左传》立于学官，从而引起了经学史上聚讼两千多年的经今古文之争。经过西汉末年刘歆的提倡后《左传》逐渐成为显学。

东汉《春秋》学者之间主要围绕着《左传》是否传《春秋》、三传中孰为孔子大义的真正表达等问题展开争论。先是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范升、陈元等人就立《左传》于学官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范升反对立《左传》的重要理由就是“《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

又无其人”。^① 由于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左传》始立而终废。但《左传》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到汉章帝时又有贾逵与李育的争论。贾逵不仅强调了“《左传》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而且他还指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② 这一招果然灵验,虽未立于学官,但被允许从《公羊》弟子中选二十名高材生学习《左传》。到东汉末年,又有了何休和郑玄的争论。何休首先发起攻击而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三部书来论三传之高下,而郑玄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到郑玄之书后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③ 当然何休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不仅于此,而在于他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不仅发挥了《公羊》的大义,而且还重点解释了《公羊》的义例,使《公羊》学至此而大备。倾向古文的郑玄据说也打算为《左传》作注,但后来给了服虔,服虔于是就有了《春秋左氏传解诂》一书。东汉比较重要的《左传》注还有贾逵《春秋左传解诂》等著作。但现在都已散佚,清人有辑本传世。汉代《春秋》学,尤其是东汉《春秋》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讖纬的密切关系。就与《春秋》相关的讖纬而言,其主要内容是神化孔子、强调《春秋》是为汉制法。在此方面可参看日本学者安积香山和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此外东汉《春秋》学者们也逐渐表现出一种通学的特点。

东汉之初,刘秀设立十四家今文博士时基本上照抄了西汉元成时期的模式。但却取消了《谷梁》家的博士,而设立了两家《公羊》博士,即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这使得《谷梁传》在《春秋》三传的斗争中往往依附《左传》而与《公羊》展开竞争。到汉章帝时贾逵与李育的争论中,贾逵对《谷梁》也抱着同情的态度:“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传》《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讖,令中道而废。”^④ 自汉宣帝时期《谷梁传》被立于学官,《谷梁传》经过了短暂的显赫,之后就长期处

①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6页。

② 同上书,第1237页。

③ 同上书,第1208页。

④ 同上书,第1237页。

于一种比较低沉的状态下。在东汉，不仅没有著名的《谷梁》学者，甚至除了何休、郑玄两本针对性的著作外，也没有什么知名的《谷梁》学著作。诸家所补的《后汉书·艺文志》中，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有段肃《谷梁传注》十四卷，也不能确定。

进入三国乱世后，战乱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公卿“能操笔者未有十人”。^①《春秋》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艰难地发展。三国的《春秋》学中重要的发展是王学的出现，王肃处处与郑玄立异，不仅遍注群经，而且还伪造经典。王肃《左传注》今存数十条于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公羊传》与《左传》的争论也还在继续，钟繇称《公羊》为卖饼家，而以《左传》为大官。身处乱世的魏禧更是一声长叹说“《左传》直相斫书耳”，^②没有亲身的感受很难说出这样深刻的话。另有《谷梁》学者糜信为《谷梁传》做注，其书早佚，但他提出谷梁子是秦孝公时人。这一说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有唐固《谷梁注》十三卷，隋时尚存。

晋代，学者们多是在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会通之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多兼通三传，坚守东汉家法门户者逐渐减少，尤其以《公羊》、《谷梁》二传为甚。而且从时人言论的引用中看，《左传》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二传。西晋《春秋》学史的重要发展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出现。杜预是一个自称有“《左传》癖”的人，本传称：“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③他的思想特点是强调“经承旧史，史承赴告”，认为孔子是修《春秋》而非作。他还完成了《左传》的条例化工作，揭示出所谓五十凡，并认为这是周公所订，而孔子则依这一条例修成了《春秋》。杜注成书后很快受到重视，逐渐压倒了先前的服虔注。但杜预依附于司马氏，这一点成为后世今文家攻击的重点，进而也说他为《左传》做注的目的和刘歆一样是为了助逆。

① 《三国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1页。

② 《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422页。

③ 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1页。

晋室东渡后，曾有人建议将《公羊》、《谷梁》立于学官，结果被晋元帝拒绝。不过这一时期产生了《谷梁》学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实际是他们父兄兄弟共同成果的结晶。范氏的特点是以《谷梁》为主兼采《公羊》、《左传》二传，他在《序》中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① 所以他对《谷梁》无传之经也加以了发挥。他特别强调了尊王之义，但同时对于弑君的态度也有所保留，显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而且在《谷梁》学发展史上，晋代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峰，据前人的著录，有十余家《谷梁注》。但今天，除了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外都已经散佚了。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学风亦有所不同，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 就《春秋》学而言大体上是南学多宗杜预，北学多宗服虔。南朝《春秋》学者可称述者有严植之、刘之遴、崔灵恩、王规之等人，所学多为《左传》。北朝《春秋》学者有徐遵明^③及其弟子，熊安生及其弟子刘焯、刘炫等人。其中当以二刘影响较大。刘炫之《春秋》学处处与杜预立异，有些颇能纠杜氏之失，但也有不少是意气之争。南北朝时期经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义疏体的产生，但《春秋》学的义疏则相对较少，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仅有刘炫的《春秋左氏传说义》、无名氏《春秋五十凡义疏》、无名氏《春秋序义疏》、无名氏《春秋公羊疏》等四种。

隋唐统一以后随着政治的统一，南北经学也得到统一。但不同之处在于政治是南统一于北，经学上主要是北统一于南。就《春秋》学而言则是杜注大行而服注逐渐消亡。隋唐时期的经学成果首先是三传《疏》的完成。《左传正义》是官修五经正义的一种，挂名于孔颖达之下，其实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左传正义》最大特点是坚持疏不驳注，将杜预的注立于

① 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1页。

② 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9页。

③ 清人有以《公羊疏》的作者为徐遵明之说，笔者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不敢轻下断语，姑从传统之说以徐彦为唐人。

一尊，对前人关于杜注的驳难都加以反驳，尤其是对刘炫更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驳斥。《春秋谷梁传疏》为杨士勋著，我们只知道杨士勋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写，具体生平也不可知。《谷梁疏》也是极力维护范注，而且能指出范说的依据，可谓范氏之忠臣。同时他还延续了范宁兼采三传的特点，对《左传》、《公羊》二传也不是一概排斥。《春秋公羊传疏》旧题徐彦著，但徐彦的生平茫昧无考，传统说法以为生活于唐后期。徐彦《春秋公羊传疏》解释了《公羊传》中发问的原由，阐发了何休注中难解的地方，对《公羊》义例进行了解说，并吸收保留了许多旧说。陆德铭的《经典释文》关于《春秋》部分也很有价值，他首先记载了《春秋》学的传授谱系，虽说后人多以为不可靠，但保留了旧说。他还对《春秋》三传做了注音和释义的工作。唐初还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中对《春秋》学的评论，他对于所谓的《春秋》笔法提出了质疑，对三传则是明显扬《左传》而抑《公羊》、《谷梁》。中唐以后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啖助、赵匡、陆淳三家所开创的“舍传求经”之风。啖、赵二人的著作今已亡佚，但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等今存，从中可以看到这三人的学术思想脉络。他们综合三传不主一传，对三传都有批驳。他们对《春秋》的所谓凡例进行了批判，比如：“杜预云凡例皆周公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①他们还指出《左传》的左氏不一定就是《论语》中的左丘明。

宋以后继承唐人的学术思路，专门从事某一传研究的学者逐渐减少。北宋初年《春秋》学方面乏善可陈，直到仁宗时期《春秋》学才开始有所发展。“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一书，承唐末五代长期动乱之后，把《春秋》尊王之义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刘敞的《春秋》学著作主要有《春秋传》、《春秋权衡》和《春秋意林》等书，陈振孙指出：“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②他对所谓的五十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尤其对所谓的赴告说十分不满。对《公羊》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更是十分排斥。他的特点是信经不信传，但他又不废三传。北宋《春秋》

^①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四库全书本。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学史上还有一桩有趣的公案就是王安石到底有没有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有详细的考辨,说明这很可能是污蔑之辞。^①但《春秋》在王安石主政时期地位不高也是事实。北宋二程也极端推崇《春秋》,反对以“史”的眼光来看《春秋》,程颐还指出《左传》的成书当在战国晚期,程颐还作有一部《春秋传》以“理”来说《春秋》。南宋初年的胡安国认为读《左传》是“虚费光阴”,对《公羊》、《谷梁》也十分不满,于是就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春秋传》。宋高宗认为其书“深得圣人之旨”,胡安国的《春秋传》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尊王攘夷”,并且强调“复仇之义”。这无疑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朱熹十分反对以“一字褒贬”来看《春秋》,并主张以“史”来看《春秋》。所以他特别看重《左传》,说“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②,而对《公羊》、《谷梁》二传的评价则不高:“《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③他一方面批判前人解《春秋》的穿凿附会,但他又自己仿《春秋》而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南宋还有吕祖谦的《左氏博议》比较重要,但吕氏此书实系史论之书。吕大圭则有《春秋五论》、《春秋或问》传世。

元代经学地位下降,《春秋》学也不例外。元朝把《春秋胡氏传》与《春秋》三传一样列于学官,所以一般元朝学者多宗胡氏。吴澄继承朱熹之学,撰有《春秋纂言》一书,兼采三传一求贯通。程端学著有《春秋本义》、《春秋三传辨疑》、《春秋或问》三书,他也反对前人以褒贬和凡例来解经,他认为《春秋》是一部“克己复礼”之书。黄泽主张复古,不满前人舍传求经的作风,主张回归三传,尤其是《左传》。黄泽的著作都已经散佚了,但其弟子赵汴的《春秋师说》基本记录了他的思想。赵汴也基本继承了其师的思想,主张复古,他的著作还有《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春秋左传补注》、《春秋金锁匙》等书。他反对前人对《春秋》笔法的强

①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②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1页。朱熹关于《春秋》的思想主要见于《朱子语类》第八十三卷。

③ 同上。

调使《春秋》成了“刑书”，但也反对将《春秋》看做史。他的《左传补注》则是对杜预和陈傅良两家进行了综合和修正。

明人学术粗疏前人所论已详，明初所修之《五经大全》备受指责，顾炎武甚至说：“经学之废，实自此始。”^①《五经大全》中的《春秋大全》是在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的基础上稍做增删而已。该书对《胡传》多所疏通发明。吕相著有《春秋说志》一书，采用问答体的形式对《春秋》进行解说，欲直探孔子之本心，很能体现明人说经的特色。明末则有高攀龙的《春秋孔义》略可一说，其书兼采汉、宋，主张以经解经和据传求经，信经采传。

清初的官方《春秋》学继承元、明余绪，其代表是《日讲春秋解义》和《春秋传说汇纂》。但许多学者并没有受官书的限制，清初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对明学的反思，主张由虚转实。其开创者是顾炎武，他主张以“征实”的态度来治学。他的《春秋》学主要体现在《日知录》卷四和《左传杜解补正》中。其中《日知录》是顾氏的《春秋》学札记，而《补正》则以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来补正杜注之失。浙东万斯大以经学名家尤善《春秋》及《三礼》，著有《学春秋随笔》一书，其特点是重视史实，不为凿空之论，《四库提要》云：“其学根柢于《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根据。”^②高士奇纯以史学的方法来治《春秋》，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和《左传纪事本末》。毛奇龄是一位性格怪异的学者，他处处与宋人立异，对宋人关于《左传》的疑问都进行了反驳，著有《春秋毛氏传》等书，其学以礼来解《春秋》，他将《春秋》分为二十二门，倒也平实。顾栋高也主张把《春秋》还原为史，所以他非常推崇《左传》，他将《左传》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等都以表的形式列出来著成《春秋大事表》一书。

汉学勃兴之后，《春秋》学的研究也朝着实证的方向继续发展。吴派领袖惠氏家族三代于《春秋》学都有著述，惠周惕有《春秋问》、惠士奇有《春秋说》、惠栋有《左传补注》。其中《春秋问》今无传。《春秋说》以礼为经，以事为纬，表现出尊古、信古之风。而惠栋《左传补注》则以

①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51页。

②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页。

申服驳杜为特色。惠栋还有《公羊古义》和《谷梁古义》，广泛征引发明古说。皖派学者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中也有三卷的篇幅用来研究《春秋》学，其成果主要在经传的训诂和校勘上。《春秋》三传所附的经文是有差异的，所以赵坦专门写了《春秋异文笺》一书对经的异文进行了考证，对产生异文的原因进行解释。李富孙则对三传的异文进行了研究，著有《春秋三传异文释》一书。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更是乾嘉时期对《春秋》和《左传》训诂考证的代表作。其书汉学特色明显，其中地理名物制度的考证十分详赡，训诂也多精当，但斥杜过甚。乾嘉时期的学者们还做了大量古注的辑佚工作，其代表作则为李貽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清儒的《春秋》学新疏则当以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代表，此书实系刘氏祖孙三代积数十年之功而成，^①该书以贾、服为主广引前人之说，考证详实。但其去取亦有不当处，比如他以《汉书·五行志》中所记刘歆之说为《左传》家之说，似乎有所不妥，西汉学者门户之见不深，尤其是像刘向、歆父子这样的通学，他们都深通《公羊》、《谷梁》二传，所以对他们的学说不可局限于一家。^②当时陈立与柳兴恩等也与刘氏相约分做其他各经的新疏，于是就有了陈立的《公羊义疏》和柳兴恩的《春秋谷梁大义述》。但陈立之书是以朴学的精神来治《公羊》之学，于义理上并无什么发明，所以杨向奎称之为“集解”。而柳氏之书的价值却不如钟文烝的《谷梁补注》，钟氏深不满于范注之略杨疏之浅，对《谷梁》久为《公羊》、《左传》所掩而深为惋惜，因而发奋为《谷梁》做补注，穷二十余年而成，其书不仅考证详博而且兼引诸子杂说，其卷首之论传论经尤其能体现钟氏的思想特点。^③此外侯康、许桂林等人对《谷梁》也都有研究，但价值均不及钟文烝。

① 实际此书还只能算是未成稿，因为只做到了襄公而止。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整理后记》认为，此书实际成于刘寿曾之手。

② 关于刘歆之学与《左传》的差异之处前人也多有论述，比如赵光贤的《左传编撰考》。杨向奎也认为刘歆是“以今文义法解释古文经的人”（《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③ 以上所述之清末以前《春秋》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本书的内容直接相关，但是西汉《春秋》学史作为整个《春秋》学史的一部分，对东汉以后的《春秋》学史进行简单的回顾，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汉《春秋》学史是十分必要的。